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20

明初江南重农抑商政策再解析——基于江南巨富沈万三为视域的研究

王琼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上海 201815)

摘要: 明朝建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 政策重新回到了“重农抑商”的轨道。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 而要“重农”必须“抑商”。“重农抑商”政策在明初对于恢复和发展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关键词: 明初; 重农抑商; 沈万三

一、前言

明朝开国之际, 由于元末长期战乱的影响,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朱元璋称帝后, 着手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稳定明初的社会环境, 为巩固王朝统治至关重要!

二、元明之际, 江南经济发展态势

所谓明初, 一般是指从洪武元年明王朝建立至宣德十年为止的六十七年, 又以洪武、永乐两代为主, 历史学家认为这段时期是“盛世”, 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比较稳定繁荣的时期之一, 但是明初也是处在一个由乱及治, 又由治渐趋动乱(靖难之役)的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 “土地荒芜”、“居民鲜少”乃普遍现象。朱元璋曾经说道: “新民望治, 犹疾忘医; 医有攻有保, 攻者伐邪, 保者扶衰; 民脱丧乱, 外邪已去, 今望扶衰。”^[1]朱元璋刚登基称帝的时候说道: “朕惟中国之君, 自宋运既终, 天命真人于沙漠……四方戡定, 民安田里”^[2], 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 朱元璋认为自己是人民生计来源的护卫者, 因为他告祭了天地, 可见朱元璋像历代帝王一样, 对土地的敬畏。大明王朝建立之初就是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 从中国的东南方向进而包抄全国的, 最后问鼎中原, 夺得天下。大家也知道自五代十国以来, 江南就是富庶繁华之地, 在我国封建社会, 各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客观存在的。

唐、宋以来, 就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东南的生产力超越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明显趋势。宋室南渡之后, 无论在人口密度、生产和消费水平、农业技术和单位产量、水利修建和利用收益、手工业以及商业的生产和经营等方面, 江南都属于全国领先地位了。

宋元时期都要仰仗东南的赋税来支持中央朝廷的财政开支, 南粮北运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富庶的江南也成为元明易代之时, 统治者加重赋税的一个重灾区了, 元朝末年, 蒙元统治者在江南地区攫取了高额赋税和大量的漕粮、钱物、劳役以维持其统治。就连朱元璋在领导反元斗争的檄文中也说到“贫极江南, 富夸塞北”, 可见当时江南的被盘剥的非常严重。清康熙年间, 苏州、松江两府绅士陆大鹏和邵元德, 曾在奏疏中对此做了说明: “苏州、松江两府为古扬州之域, 厥田下下。宋绍熙元年, 朱子行经界法, 吴民田每亩科粮五升, 民田之额始于此。元初, 苏郡增至三十六万, 松郡增至二十余万, 此加增之所自始也。”^[3]

综合来看, 每次朝代更迭的时候, 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只会是越来越重! 这样一来, 江南的民生问题肯定会越艰难, 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朱元璋曾说, “我积少而弗多, 取给于民, 甚非得已, 亦皆为军需计用”。^[4]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明初几十年统治中全部依靠江南财政来维持帝国的运转。

作者简介: 王琼平(1981—), 男, 江苏苏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讲师。

三、沈万三家族的兴起与元明易代之时经济政策的调整

周庄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也是笔者的家乡，是江南六大古镇之首，有“中国第一水乡”之誉。周庄镇旧名贞丰里，据史书记载，北宋元佑年间（1086年），周迪功郎信奉佛教，将庄田二百亩，捐赠给全福寺作为庙产，百姓感其恩德，将这片田地命名为“周庄”。1127年，金二十相公跟随宋高宗南渡迁居于此，人烟逐渐稠密，周庄元代时属苏州府长洲县。

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由湖州南浔迁徙至周庄东面的东宅村（元末又迁至银子浜附近），因经商而逐步发迹，使贞丰里出现了繁荣景象，形成了南北市河两岸以富安桥为中心的旧集镇。到了明代，镇廓扩大，向西发展至后港街福洪桥和中市街普庆桥一带，并迁肆于后港街。明代中期属松江府华亭县。沈万三利用白蚬江（即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接浏河的优势，出海贸易，将周庄变成了一个粮食、丝绸及多种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促使周庄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最突出的产品有丝绸、刺绣、竹器、脚炉、白酒等。

再来说说沈万三这个人，综合梳理资料和之前的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首先沈万三生卒年具体不详，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沈氏家族是元朝中叶从南浔迁到周庄的。陈兆弘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明初巨富沈万三的致富与衰落》一文中说沈万三的发家，是从自己的勤劳垦殖开始的。“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穡”，说明沈万三依靠垦殖发富，他有了立业的根本。以后沈万三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使其财富的积累上更加丰厚。“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5]这个陆氏是元代汾湖富户陆德源，他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于是看破了红尘，把自己家巨额财产如果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去世。经过陆氏赠财，沈万三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且他得到了巨资后，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他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白蚬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同时开展“国际贸易”，或者叫“通番”赚取了巨大财富。

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他是通过垦殖而积累原始财富的，接着善于利用别人的金钱，并大胆地“竞以求富为务”，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扩大资本。从而使他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实为沈万三之功。通过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沈万三通过“垦殖”、“陆氏赠财”、“海外贸易”等手段积累了巨大财富。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加剧，据史料记载，当时南浔闹水灾，实在没活路了，沈家先人举家搬到周庄，沈家刚到周庄，财富平平，但是沈家能从自足的小农之家经营为地方巨富，得益于元代的相对宽松的经商环境，元代纵商政策也致使大地主和大商人阶级膨胀，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异悬殊，社会动荡，最终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 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6]。元代重农的同时也实行保护和鼓励发展商业的政策，为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官本船法。至元“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7]江南之地，元明之际受到沉重的盘剥，永乐迁都北京，江南地区的负担更为加重。原来当年就近供应南京的粮食及诸色用品，绝大多数都要按期如额转输到北京交纳。

洪武中叶，东南亦有运粮往北的，但主要只是为供给辽东等地边塞屯军之用，每年的数量不过三四十万石。迁都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漕粮的数额一跃到二百万石，到永乐末年，达到近四百万石。除了一般漕粮以外，还有指定由苏、松、常、嘉、湖五府供应并负责运送交纳的白粮十六万石，被称之为“上方之玉食”。^[8]

明朝当时有官田和民田之分，二者征税的额度完全不同，按照朱元璋在洪武初年的规定，官田和民田分别应交纳给官府的税粮数目有极大的悬殊，一般民田，每亩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9]。朱元璋刚登上帝位，就在《初元大赦天下诏》中明确宣布，“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已业”^[10]。当然重赋的同时，明初也进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比如“粮长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洪武二年，发松江、嘉兴民夫二万人开上海胡家港，将槽道与海口接通，七年至九年，在常熟县开奚浦，直达塘堰坝，二十三年修筑崇明县和海门县已溃决堤岸二万三千余丈，共役人夫二十五万人，二十四年，修筑宁波、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县的东眺湖，可以灌田数万顷，二十五年开凿溧阳良墅东坝河道，役夫三十五万九千人，二十八年，开凿松江的太平河，三十一年，径阳县的洪渠堰圯坏，派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工修治，浚渠十万三千余丈，可灌五县之田万顷。^[11]

综合来看，明初统治集团还是比较重视农业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明初也在推行种植多种作物的政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政策本身符合江南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例如松江府,“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12],这些政策一方面为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基础,也为周庄的沈万三发展海外贸易储备了贸易物资,然而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环境中,士农工商依次等级,重农抑商是传统的治国策略。

元代大体继承了宋代的经济政策,在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棉织业、印染业、丝织业、制瓷业等都有长足发展,商业也很活跃,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较宋代又有进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在江南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的大城市。

明朝建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政策重新回到了“重本轻末”的轨道。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而要“重农”必须“抑商”,让主要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为此朝廷又建立起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一般农民不能脱离本身的户籍去经商,而商人也只能在本本地经营,想去外地,手续十分繁杂。作为商人的沈万三难免会成为政府打压的对象,例如在当时实行粮长制,洪武四年设立粮长制,规制以纳粮万石的土地为一个单位,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江南地区负担了国家最主要财政收入,也最先实行粮长制。在粮长制设立当年“户部奏浙江行省民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岁输粮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设粮长一百三十四人,”^[13]

明代设立粮长制的目的就在于以良民治良民,富民在一定程度上是沟通官民的桥梁,国家依靠富民实现其对广大的乡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节省治理成本。粮长制作为国家制度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保证国家财源,而任粮长的富户在地方除是国家统治的代表外,更多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地方豪强,也就导致他们在以国家的名义执行粮长任务时,更多考虑地方豪强团体的利益,因而粮长制“以良民治良民”的理想状态,不可能完全实现。粮长舞弊就是地方与中央利益矛盾问题的表现,后来矛盾不可调和,势必会遭到排挤打压,沈家当时还担任户部官职,例如沈茂和沈玠任官职掌,户部仓曹员外郎主管漕运、仓储出纳,广积库是户部属衙,管理库藏。^[14]

可见朱元璋先笼络江南富户是出于明初社会治理重建和国家统治机制建设运行亟需资金的现实考虑。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江南富户掌握经济命脉的形式与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存在根本利益分歧。朱元璋重用沈家为政府办事,地方势力和国家权力的冲突也随之相伴,朱元璋和沈家的关系也显得微妙。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沈家因为女婿顾学文利用粮长职权通奸被卷入到这场肃清政敌、排除异己的政治风暴中,借由蓝党之名打击以沈万三家族为代表的富户,最重要的就是削弱这些富户江南经济的把控。在蓝玉案当年便“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15]这意味着沈茂和沈玠不再担任户部官职,皇权赋予的沈家经济控制权力的合法性被剥夺。可以说,蓝玉案是打垮沈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综合来看,明初对江南富户实行两面手段,一方面利用经济实力为新王朝服务,另外一方面把江南富户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稍有突破,必遭打压。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地主占据优势的经济地位,进而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

四、朱元璋调整经济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明朝初年为什么重新强调“重本轻末”呢?大概有以下几条原因

1. 朱元璋的小农思想影响,他出身卑微,经历曲折而丰富,曾经说过“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与食也”,所以登基以后大力发展农业,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通过这些措施使农业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2. 元朝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赋税繁重,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作为封建统治的根基,小农经济体系在元朝已经名存实亡。
3. 元明之际,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人口大量逃亡巩固新政权的关键首先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和朝廷的基本支出,集中全力恢复农业发展便成为首要任务。
4. 开国初,朱元璋勤俭节约,闻名于世,那些官僚贵族贪图享乐,败坏社会风气,这使他无法容忍的,再加上商业和商人常与逐利、享乐相联系,与崇俭的思想相悖,而务农重本则与抵御奢靡享乐一脉相承^[16]。结语:这种政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另外打压工商业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导致明朝中后期经济结构无法转型且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参考文献:

- [1]谈迁 国榷卷二.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2]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 上海 1948 慕印本

- [3]嘉庆《松江府志》卷二一，《田府志》
- [4]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 [5]《周庄镇志》卷六·杂记
- [6]明太祖实录 台北：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7]脱脱.元史 北京 中华书局，1976
-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一，《江南》《北运 白粮》。
- [9]杜宗植《上巡抚侍郎周忱书》载《日知录 集释卷一〇》
- [10]《皇明诏令》卷一
- [11]乾隆《江南通志》卷六三，《河渠志水利治绩》
- [12]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 [13]明太祖实录.台北,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14]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
- [15]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美 牟复礼 剑桥中国明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analysi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s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ing Commerce in the Jiangnan Region — A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hen Wansan, the Great Wealthy Magnate of Jiangnan

Wang Qiong-P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Tianhua College, Shanghai 201815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situation reversed, and policies returned to the track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Zhu Yuanzhang believed that only by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could the people be "enriched," and to "emphasize agriculture," it was necessary to "restrain commerce." The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ing commerc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storing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Jiangnan region and stabilizing 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base. However,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handicraf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s limitations gradually became apparent.

Keywords: Early Ming Dynasty; Emphasize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 commerce; Shen Wansan.